

毛泽东中国革命新道路理论的当代价值

——纪念《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发表80周年

梁柱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871)

[摘要] 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独立领导革命战争,探索适合中国革命特点的、新的革命道路的伟大创造,是毛泽东思想形成的一个重要标志。它作为一条具体的农村包围城市道路,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但它的思想内涵却有着不可磨灭的当代价值,特别是蕴含其中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思想,所体现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以及所表现的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创新精神,对于我们今天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仍然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

[关键词] 毛泽东;中国革命新道路;当代价值

[中图分类号] D2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0599(2010)02-0025-07

毛泽东在1930年1月5日致林彪的信(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总结了两年多来农村武装斗争的经验,进一步分析了中国的特殊国情,明确指出:“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1]P98}这一论断,丰富和发展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确定了要以农村为中心的新的发展方向,基本上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这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独立领导革命战争,探索适合中国革命特点的、新的革命道路的伟大创造,是毛泽东思想形成的一个重要标志。它作为一条具体的农村包围城市道路,到1949年3月七届二中全会确定把党的工作重心转到城市,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但

它的思想内涵却有着不可磨灭的当代价值,特别是蕴含其中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思想,所体现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以及所表现的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创新精神,对于我们今天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仍然有着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一、中国革命新道路所昭示的一切从中国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则,对于我们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有着典范性作用和重要的启示意义

对于把党的工作重心放在农村,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道路,正如周恩来在总结

[收稿日期] 2010-02-19

[作者简介] 梁柱(1935—),男,福建福州人,北京大学原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兼职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和毛泽东思想。

中国革命经验时所说：“要党不用主要的力量与城市无产阶级联系，而把主要力量放在农村，这是史无前例的。共产国际的一切文献，一讲到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就是同工人运动联系在一起的。”中外革命所提供的还只有由城市到农村这样一种夺取政权的经验：作为国际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巴黎公社，就是以巴黎为中心城市起义的；俄国十月革命也首先是从城市的工人和士兵起义开始，然后向全国扩展的；中国的大革命时期也首先是以广州等大城市为根据地，然后向全国扩展，这和我们党的先从事工人运动后发动农民的工作路线相吻合的。“所以在历史上无论古今中外都找不到农村包围城市的经验”。^{[2]P178}正因为这样，这条中国革命新道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未能形成全党的统一认识，党为此而付出沉重代价，也就难以避免了。

大革命失败后，党在实现战略转变、确立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这一正确的斗争方向时，共产国际无疑起了积极的作用。1926年11月，斯大林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中国委员会会议上论中国革命的前途时就已经指出：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和优点之一。这一正确的论断，对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国共产党人认识武装斗争的重要性，都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但在武装斗争的进军方向，中国革命的具体道路上，共产国际仍然是以城市中心论来指导中国革命的。共产国际负责人布哈林在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政治报告中，对农村根据地的重要性仍然缺乏认识，而强调中心城市的作用，他说：“没有城市帮助的，确切点说，没有城市领导的全体农民暴动，结果是不免失败的。没有工业中心胜利的革命胜利，是荒诞无稽的。”他批评中国党在一些地区“重视农民，甚于重视工人”，认为中国党组织武装暴动的“准备工作，主要是建立城市工作，加强无产阶级的领导和组织”，以便“以城市工人领导农民的自发暴动”。这种指导思想也表现在1928年2月共产国际执委会在《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中，这个决议正确批评了中国共产党1927年底、1928年初所犯的盲动主义错误，对纠正这一错误起了重要作用，但对党的工作重心，它认为：党在领导个别省份自发的是农民游击队行动时，应当看到，只有这些行动同各无

产阶级中心的革命新高潮结合起来，才能成为全民起义的胜利起点。在这方面还应当看到，党的主要任务，是在乡村和城市、在一系列相邻的省份组织和统一步调的普遍行动，而且有组织的大规模行动。因此必须反对热衷于零星分散、互不联系的游击战争。这种战争注定要失败（湖南、湖北以及其他地区就有过这种危险）。直到1940年，周恩来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时，共产国际领导还担心我们离开工人阶级太远了，当时周恩来解释说：“我们在农村里经过长期斗争的锻炼，有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完全可以无产阶级化”。结果，“共产国际的一些同志听了之后大哗，不以为然”。^{[2]P178-179}很显然，这种脱离1927年后中国革命形势和中国基本国情的城市中心论的错误指导，不能不对中国革命的进程产生严重影响。

在一个相当长的期间，党的领导机关同样囿于城市中心论，以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共产国际的指示，使中国革命走了一段痛苦的弯路。应当看到，当时全党认识还停留在城市中心论上，这是并不奇怪的一种历史现象。这种占主导地位的共识反映在当时的实际斗争中，如在大革命失败后先后发动的三次武装起义，都是以攻占中心城市为目标的。但在这些起义遭到失败后，大多数都自觉或不自觉地转入农村，在一些地区建立起农村革命根据地。

1928年召开的中共六大，总结大革命失败以来各地斗争的经验，肯定了党在农村发展苏维埃根据地，进行游击战争，发动土地革命，指出这种斗争将成为“决定新的高潮之一的主要动力之一”。这无疑是正确的。但这并没有改变原有的以城市工作为中心的方针，大会仍然强调，“党的主要任务是争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并认为，“农民的武装暴动只有在城市革命潮流高涨并受工人阶级指导的时候，才能胜利”。大会虽然指出轻视农民斗争是错误的，但又说“过于重视农民斗争”，“也是一种极不正确的倾向”。由此可见，六大并没有实现向以农村为中心的转变。但在实际上，不但所期望的中心城市暴动没有出现，相反，凡是坚持农村斗争并采取正确的政策，党和工农红军的力量都获得了发展。正如周恩来所指出的，如果说，在1927、1928年前后还不可能产生乡

村中心的观念,那么,1929、1930年,应该产生这种观点了。因为到1930年春,农村革命根据地获得了较大的发展,建立了赣西南、闽西、湘鄂西、湘鄂赣、湘赣等10多块重要根据地,散布在这些根据地的红军已有62000余人的13个军。这是有可能产生以农村为中心思想的重要依据。但遗憾的是,这时中央领导机关仍然固守城市中心论,继续要求红军力量用来配合夺取中心城市,最终导致了更加严重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

这个时期固守城市中心论的,也并非中国共产党所独有。大革命失败后,以邓演达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同样举起反蒋武装斗争的旗帜,建立了第三党组织,反对蒋介石反动统治。但它在一个时期内,也不赞成中国共产党进行的农村斗争,认为这种“无计划无系统的游击式的农民暴动”,“只能造成刘邦、朱元璋式的革命,决不能建立社会主义革命基础”,断言“中国共产党在湘、鄂、赣及边远地区所煽动起来的暴动与所谓的苏维埃政权,只是偶然的现 象”,其失败则是“当然”的。^{[3]P44-45}该党后来也是通过实践逐步改变了这一看法。由此可见,在中外革命历史上还只有以城市为中心这样一种经验的情况下,要进行新的探索是需要巨大的理论和实践的勇气,要敢于走前人没有走过的一条新路。

毛泽东所以能够在理论和实践上探索出一条中国革命的新道路,从根本上说,是同他自觉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原则紧密相关的。1930年5月,他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首先提出了反对教条主义的任务。他鲜明地指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虽然这时王明的错误还未出现,但党内已经存在依靠共产国际给我们写决议、给我们写纲领、向我们作指示等问题。中国革命是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形,还是依靠外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形?这的确是关系到党和革命的命运与前途问题。毛泽东的上述重要命题所蕴含的独立自主、一切从实际出发的重要思想,为确立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正是依据这样的思想原则,毛泽东能够在实践中总结斗争的经验,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确定自己的革命道路。当时,毛泽东着眼于这样两方面

的实际,思考和探索新的革命道路:一方面,从1927年革命失败后党面临的国内形势出发,这时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力量在大资产阶级的突然袭击下遭到了惨重的损失,国民党反动统治占据了中心城市,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白色恐怖。在这种情况下,下列两种做法都是不可取的:一是偃旗息鼓,采取取消主义的态度,把革命引向彻底失败;二是继续以城市为中心,在革命主观力量还很弱小的情况下采取盲动主义、拼命主义的做法,这同样也会葬送中国革命的前途。因此,在这种形势下,中国革命必须另辟蹊径,走一条非城市中心的新的发展道路。另一方面,从中国的基本国情出发,在中国,农民是主要群众,他们是中国革命的最深厚的力量源泉,而广大农村又是反动统治无法完全控制的地区,革命力量有可能首先在那些经历过大革命的影响、仍有红色种子存在的农村地区获得发展。因此,党的主要力量从中心城市退却,向革命力量最深厚的农村进军,是当时唯一正确的发展方向;而且,只要中国革命的形势不是停滞的,而是继续向前发展的,那么,以农村为依托的革命力量就一定会发展成为复兴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我国民主革命发展的历程,证明这是完全正确的选择。

毛泽东确立的中国革命新道路理论,生动地体现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对于我们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具有典范性意义。

二、毛泽东创立的中国革命道路,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国家与革命的学说,特别是暴力革命的原理,同时又紧密地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而在理论和实践上有所创新

毛泽东创立的中国革命道路深刻地体现了党的思想路线中所蕴含的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统一的原则,对于我们坚持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具有方向性的重大意义。

毛泽东在总结中国革命基本经验时强调:“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

普遍地对的。”^{[1]P541}马克思主义指明,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因为只有推翻维护反动的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旧政权,才有可能实现解放生产力这一革命的根本目的。这是中国革命面临的一个根本任务,也是毛泽东始终坚持的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则。

暴力是新社会的助产婆。列宁曾指出:“各国人民生活中的重大问题只能用强力才能解决。反动阶级总是自己首先使用暴力,发动内战,‘把刺刀提到日程上来’。”^{[4]P310}这就是说,在世界革命的历史进程中,暴力革命是普遍规律。这一点,在中国表现的更为突出。这是因为,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存在着尖锐的民族矛盾和社会矛盾,一切反动统治都是建立在刺刀之上,在内部没有民主制度可言。因此,“无议会可以利用,无组织工人举行罢工的合法权利”,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不可能通过长期的合法斗争来教育群众、积蓄力量;这在欧洲主要是通过议会和工人的合法斗争来实现的,而在中国就只能在革命战争的过程中来进行。这种特殊的国情,就是毛泽东所说的:“以农民为主要经济的中国的革命,以军事发动暴动,是一种特征。因而,‘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主要的和差不多开始就面对着的任务,是联合尽可能多的同盟军,组织武装斗争,依照情况,反对内部的或外部的武装的反革命,为争取民族的和社会的解放的斗争而斗争’。”“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地位,就不能完成任何的革命任务。”^{[1]P508-509}

毛泽东在回顾自己的人生经历时曾经这样说过:“1921年,中国成立了共产党,我就变成共产党员了。那时候,我们也没有准备打仗。我是一个知识分子,当一个小教教员,也没学过军事,怎么知道打仗呢?就是由于国民党搞白色恐怖,把工会、农会都打掉了,把五万共产党员杀了一大批,抓了一大批,我们才拿起枪来,上山打游击。”^{[5]P530}正是中国特殊的斗争环境,造就了这位伟大的军事家。

毫无疑义,毛泽东是我们党内自觉地认识和强调武装斗争重要性的一位杰出代表。在国民革命兴起之时,毛泽东就强调党直接掌握武装的重要性,提出在反对封建势力的斗争中,“农民得到

武装实为重要条件之一。农民应该有自卫的武装组织”。当武汉形势危急之时,他就对来到武汉的湖南同志提出,回到原来的工作岗位,长沙站不住,城市站不住,就到农村去,下乡组织农民。要发动群众,恢复工作,山区的人上山,滨湖的人上船,拿起枪杆子进行斗争,武装保卫革命。他一再明确提出,要用武力来对付反动军队,以枪杆子对付枪杆子,特别强调在这个重大问题上不要再徘徊观望。汪精卫集团叛变革命后不久,他在中共中央常委会上指出,“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6]P205}在党的八七会议上,毛泽东在发言中从国共合作、农民问题、军事问题和党的组织四个方面批评陈独秀的右倾错误,着重指出:秋收暴动非有军事不可,党要非常注意军事问题,“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6]P208}他还“建议中央,用大力做军事运动”。随后,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湖南运动大纲》,经政治局常委批准。对此,他作了这样说明:“前不久我起草经常委通过的一个计划,要在湘南形成一师的武装,占据五六县,形成一政治基础,发展全省的土地革命,纵然失败也不用去广东而应上山。”^{[6]P209}在参加湖南省委讨论秋收暴动时,毛泽东指出:秋收暴动的发展是要夺取政权、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要发动暴动和夺取政权,没有军事武装单靠农民力量是不行的。“我们党从前的错误,就是忽略了军事,现在应以百分之六十的精力注意军事运动,实行在枪杆子上夺取政权,建设政权”。^{[6]P210}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毛泽东开创了井冈山工农武装割据的局面。从这里可以看到,毛泽东不但强调武装斗争的重要性,而且自觉地把武装斗争同夺取政权的任务紧密地联结在一起,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的深刻理解并自觉地运用到实践中去。

从上述毛泽东强调武装斗争重要性的论述中,已经有了“上山”、“土地革命”等重要思想,正如这时他不愿留在中央工作时所表示的,不愿去大城市住高楼大厦,愿到农村去,上山结交绿林朋友。当然,这还不能说这时已经有了以农村为中心的思想,但又应该看到这是他逐步取得这一认识的重要的思想元素。正是通过井冈山、赣南闽西的斗争经验,逐步形成了武装斗争、根据地建

设、土地革命这样三位一体的中国革命新道路。

同时,在强调以军事斗争为主要特征时,毛泽东还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把农民出身占多数、仍带有旧式军队影响的队伍,逐步改造成为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还在三湾改编时,就建立了“支部建在连上”的制度,确立了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原则,并在军队内部建立了士兵委员会,努力消除旧式军队的影响;在井冈山时期,确立了红军必须担负打仗、做群众工作和筹款三项任务,克服单纯军事观点,并提出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后发展为八项注意),规定了正确处理军政、军民、官兵关系的准则和优待俘虏、瓦解敌军的政策。1929年12月,毛泽东为古田会议起草的决议,总结了红军创建以来党在同各种错误思想作斗争中积累起来的丰富经验,强调了无产阶级思想的领导作用,“使红军肃清旧式军队的影响,完全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这个决议不但在红军第四军实行了,后来各部分红军都先后不等地照此做了,这样就使整个中国红军完全成为真正的人民军队”。^{[1]P85}

由上可见,毛泽东在探索中国革命新道路时,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为指导,同时又紧密地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使二者完美地统一起来。毛泽东是在党内主张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主要的倡导者和领导者,同时也是要求全党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的最热忱的倡导者和领导者。毛泽东始终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理论武器,他为了正确认识和掌握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的发展规律,毕生致力并倡导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毛泽东不但非常重视党员的理论学习,而且还积极引导他们掌握理论联系实际的科学方法。在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党和红军曾多次受“左”倾教条主义的干扰,中国革命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这也激发毛泽东更加发愤研究马列著作,以更好地掌握指导中国革命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是由于毛泽东不倦地倡导学习和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不但提高了党和红军的思想理论水平,而且也为探索中国革命新道路奠定了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

在毛泽东看来,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如果离开了这个基点,所谓的中国化就会步入歧途。同时他又认为,中国共产党人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应用,“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1]P707}上述两个方面的统一,就是毛泽东所提倡的实事求是的学风,也就是他所说的“矢”和“的”之关系。全面地、辩证地理解和处理这两方面的关系,对我们坚持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三、毛泽东对中国革命新道路的探索,是通过对中国社会、革命形势和农村情势的周密的调查研究实现的

调查研究是实事求是的内在要求,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中间环节和桥梁,这对于我们坚持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着重要的启迪意义。

实事求是即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也就是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而调查研究则是达到实事求是的根本方法。1930年5月,毛泽东就提出:“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因此,我们需要时时了解社会情况,时时进行实际调查。”^{[1]P115}他严肃指出:“许多的同志都成天地闭着眼睛在那里瞎说,这是共产党员的耻辱,岂有共产党员而可以闭着眼睛瞎说一顿的吗?”^{[1]P109}他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一振聋发聩的警示。毛泽东不仅把调查研究看作是党必须遵循的工作路线和工作方法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方面,而且把调查研究提到洗刷唯心精神,防止一切机会主义、盲动主义错误的哲学高度来认识。事实上,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过程中所以能够把握正确的发展方向 and 制定正确的策略,是同他始终以一种“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恭敬勤奋地向群众学习、向社会作调查紧密相关的。

紧密地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在调查研究中求得真知,这是毛泽东领导方法的一大特色,也是他探索中国革命新道路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立足点和出发点。毛泽东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开始也是以攻打中心城市长沙为目标的,但在起义部队遭到挫折后,他没有机械执行上级的决定,而是根据实际情况,耐心说服起义将士,作出了“向萍乡退却”的决策,果断地摒弃了攻打中心城市长沙的原定计划,向敌人统治薄弱的农村地区转移。这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战略转变,为坚持长期的以农村为根据地的武装斗争奠定了坚实基础。在根据地的选择上,正如毛泽东向中央报告所说的,“整个的罗霄山脉我们都走遍了”。经过周密的调查研究,“各部分比较起来,以宁冈为中心的罗霄山脉的中段,最有利于我们的军事割据”。^{[1]P79}于是,井冈山成为中国革命的第一个根据地。在井冈山时期,在军事斗争、土地革命和政权建设等方面,也都是坚持从实际出发、调查研究的工作路线,力求自己政策的正确。

井冈山根据地的建立,是标志着把工作中心转入农村的伟大开端,但要自觉地认识和实现这种战略转变也不能不经历一个过程。对于作为这项事业最主要的开创者毛泽东来说,也同样经历一个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1928年10月,毛泽东为湘赣边界第二次党代会起草的决议案中,科学地论证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的原因,并第一次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这就是他随后阐发的把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这三者密切结合的思想。这些重要思想增强了人们坚持农村根据地斗争的信心和决心。但在这时毛泽东也还没有明确形成把工作中心放在乡村的思想,“他也还是认为要以城市工作为中心的。开始他还主张在闽浙赣边创造苏区来影响城市工作,配合城市工作”。^{[2]P179}随着农村斗争的进一步发展,革命潮流逐渐回升。毛泽东在1930年1月致林彪的信中,就对农村根据地的意义作了充分的估计,指出:“必须这样,才能树立全国革命群众的信仰,如苏联之于全世界然。必须这样,才能给反动统治阶级以甚大的困难,动摇其基础而促进其内部的分解。也必须这样,才能真正地创造红军,成为将来大革命的主要工具。总而言之,必

须这样,才能促进革命的高潮。”^{[1]P98}这就有了明确的以乡村为中心的思想,基本上形成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

土地革命是中国革命新道路的题中之义。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是农民问题,而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土地问题。当时提出“深入割据地区的土地革命”,在根据地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彻底推翻封建土地制度,发展生产,改善农民生活,巩固革命根据地的基础。为了保证土地革命正确而健康的开展,毛泽东做了大量调查研究的工作。他在《宁冈调查》和《永新调查》的基础上,科学分析了边界土地状况:“大体说来,土地百分之六十以上在地主手里,百分之四十以下在农民手里。分别说来,赣边以遂川为最集中,约百分之八十是地主的,永新次之,约百分之七十是地主的。宁冈、莲花两县土地虽说自耕农不少,然地主的土地仍占比较多数,约百分之六十与四十之比。湘边两县相差不远,约百分之七十在地主手中。”^[7]从而为制定正确的土地革命政策提供了现实的依据。

当然,对客观事物的规律性的认识,有一个由浅入深、由表入里的反复过程,对毛泽东来说也同样是这样。像他领导制定的《井冈山土地法》,是我们党的第一个土地法,指导了根据地土地革命的顺利进行。但这部土地法还不完善,比如规定没收一切土地而不是只没收地主土地,土地所有权只属政府而不属农民,禁止土地买卖等条例,还不符合客观实际的要求。这些缺陷,在后来《兴国土地法》中得到纠正。这正如毛泽东所说:“我自己认识农村,就是经过好几年的工夫的”。“到井冈山之后,我作了寻乌调查,才弄清了富农与地主的问题,提出解决富农问题的办法,不仅要抽多补少,而且要抽肥补瘦,这样才能使富农、中农、贫农、雇农都过活下去。”“贫农与雇农的问题,是在兴国调查之后才弄清楚的,那时才使我知道贫农团在分配土地过程中的重要性。”^{[8]P21-23}毛泽东这种甘当小学生的态度和科学的调查研究方法,堪称全党典范。

在坚持农村根据地的斗争中,由于敌人十分强大,红军力量极为弱小,在井冈山时期就有人提出了“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这就是说,在四周白色恐怖的包围下,弱小的红军能不能存在

下去,能不能依靠农村的斗争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到来?这是坚持这条新道路必须正确回答的一个基本问题。毛泽东通过对中国社会基本矛盾的具体分析,通过对敌人营垒的深入调查研究,不但对中国红色政权能够存在和发展的详细进行了详细的论证,并指出中国革命的高潮不但会到来,而且会快要到来。他对“快要”二字作了这样的描述:“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

中的快要成熟了一个的婴儿。”^{[1]P106}在毛泽东作出这一预见的一年多之后,由“九一八事变”而引发的全国性抗日反蒋热潮就出现了,遗憾的是,由于王明的错误,我们党没能抓住这个机遇。

今天,我们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抓住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应对面临的严峻挑战,同样要大力弘扬调查研究的作风,要把转变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作为转变发展方式的重要前提,保证积极稳妥地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推向前进。

[参考文献]

- [1]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2] 周恩来.周恩来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 [3] 宋春,刘志主编.民主党派与中共合作史[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1.
- [4] 列宁.列宁全集:第3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 [5] 毛泽东.毛泽东外交文选[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
- [6]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7] 毛泽东.井冈山前委对中央的报告[Z].1928-11-25.
- [8] 毛泽东.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The Contemporary Value of Mao Zedong's Theory on the New Road of Chinese Revolution

——To Memorialize the 80th Anniversary of the Release of

A Single Spark Can Start a Prairie Fire

LIANG Zhu

(School of Marxism,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The theory of surrounding the cities from the countryside and seizing the power by armed forces is a great creation made by the Chinese communists represented by Mao Zedong in leading the revolutionary war independently and exploring the new revolutionary road fit for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revolution, and it is an important sign indicating the forming of Maoism. As a concrete road of revolution, it has finished its historical mission. However, it has indelible value in contemporary China. Particularly, the important thought of localizing Marxism in China, the Marxist standpoint, view and methods, and the theoretical innovation spirit of Chinese communists implied, embodied and presented in this new revolutionary road still has important theoretical value and can be employed as practical guidance for us to go on boosting the sinification of Marxism and the cours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 Mao Zedong; new road of Chinese revolution; contemporary value

(责任编辑:贺文赞)